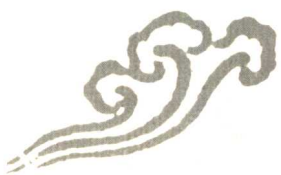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齐涛

著

韩偓诗集笺注

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韩偓诗集笺注

[唐]韩 偓 著

齐 涛 笺 注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韩偓诗集笺注
[唐]韩偓著 齐涛 笺注

出版者：山东教育出版社
(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：250001)
电话：(0531)2023919 传真：(0531)2050104
网址：<http://www.sjs.com.cn>
发行者：山东教育出版社
印刷：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
版次：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1000
规格：850mm×1168mm 32 开本
印张：10.625 印张
插页：4 插页
字数：258 千字
书号：ISBN 7—5328—3072—1/1·92
定价：14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前 言

韩偓，字致光，京兆万年人，自号玉山樵人，小字冬郎。其父韩瞻，开成六年（841年）进士，与李商隐同年，相交甚笃。偓十岁时，曾即席为诗送之，一座尽惊。李商隐赠诗云：“十岁裁诗走马成，冷灰残烛动离情。桐花万里丹山路，雏凤清于老风声。”自此至后梁龙德三年（923年）病逝，韩偓活跃于诗坛五十余年，留有诗作三百余首，是晚唐五代时期颇有代表性的一位诗人。

—

韩偓出自世家，又天资聪敏，但举进士却屡试不第。自初入举场到龙纪元年（889年）及第，间关困顿二十四载，感触颇多。《夏课成感怀》写道：“别离终日心忉忉，五湖烟波归梦劳。凄凉身事夏课毕，濩落生涯秋风高。居世无媒多困蹶，昔贤因此亦号咷。谁怜愁苦多衰改，未到潘年有二毛。”及第后，因政局动荡，又无权要相托，未能在朝中谋得席位，而是东赴

河中，投于河中节度使王重盈门下。《新唐书·韩偓传》称其“擢进士第，佐河中幕府，召拜左拾遗，以疾解”。这一过程记载过简，从韩偓诗作，可以看到他被召拜左拾遗后累迁谏议大夫，“以疾解”大概是嫌品级过低。因为从唐末政坛看，第进士后至大藩幕下一段，一般可回朝中谋得“员外郎”一类的职级，即从六品上，而左拾遗仅为从八品中。如崔胤，乾宁二年（895年）方第进士，也是到河中王重盈处为从事有年，后入朝为考功员外郎。大约不久以后，唐廷即任命韩偓为刑部员外郎。这是一个清流官，受人重视。韩偓也想以此成就自己的功名。但为时不久，他又被权要排挤，离开朝中。有诗《余自刑部员外郎为时权所挤，值盘石出镇藩屏，朝选宾佐，以余充职掌记，郁郁不乐，因成长句寄所知》，诗中对自己境遇之坎坷，前程之渺茫，感慨良多。他写道：“正叨清级忽从戎，况与燕台事不同。开口谩劳矜道在，抚膺唯合哭途穷。操心未省趋浮俗，点额尤惭自至公。他日陶甄寻坠履，沧洲何处觅渔翁。”当然，韩偓此时不会真的去做什么沧浪渔翁，他还是到了这位藩使的掌书记任上。后来，又被召入朝中，擢任左谏议大夫，这些都是天复元年（901年）以前发生的事情，具体过程史焉不详。

韩偓之擢任左谏议大夫，至迟在光化三年（900年）下半年，因为在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二的记事中，天复元年正月，韩偓已以左谏议大夫的身份出现。左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，需要时，可以此同平章事。至此，韩偓跻身于唐王朝的政治中心。以后四年间，是其政治生涯的巅峰。他身处枢要，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朝政。他此时的事迹与诗作，无不与唐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。

2 前言

这一时期的唐王朝已是千孔百疮，外有强藩割据，政令不行，混战不已；朝内则是宦官专权，矛盾重重。其中，主要矛盾是崔胤与王搏两相相争，焦点是宦官问题。唐后期宦官势力过度膨胀，专制内外，左右朝政。崔胤一直与昭宗密谋除去宦官，宦官与崔胤等朝臣之间矛盾日益尖锐，双方各结藩镇为依托。此时，崔胤与另一相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王搏相左，王搏主张：“人君当务明大体，无所偏私，宦官擅权之弊谁不知之？顾其势未可猝除，宜俟多难渐平，以道消息。”崔胤则言：“王搏奸邪，已为道弼辈外应。”道弼即枢密使宋道弼。光化二年（899年）初，崔胤罢相，不久，又出任岭南节度使。崔胤认为是王搏之排斥，故临行前，致朱全忠书，请其上表贬王搏。朱全忠遂上表言：“胤不可离辅弼之地，搏与敕使相表里，同危社稷。”表连上不已，昭宗不得已，只好在光化三年六月将崔胤召回，任为相。王搏及两位权阉枢密使宋道弼、景务修都赐自尽。史称经此之变，“胤专制朝政，势震中外，宦官皆侧目，不胜其愤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二）。

九月，崔胤又兼判度支充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他以朝散大夫王搏为盐铁副使，以韩偓为度支副使。《新唐书·韩偓传》称：“宰相崔胤判度支，表以自副。”即言此事。

韩偓与崔胤的关系，史籍阙载。依《旧唐书·崔胤传》所记，崔胤为清河崔氏之后，宰相崔慎由之子，“乾宁二年（895年），第进士，王重荣镇河中，辟为从事，入朝，累迁考功、吏部二员外郎……大顺中，历兵部、吏部二侍郎，寻以本官同平章事”。《旧唐书》所记崔胤及第时间有误，其一，据《资治通鉴》，乾宁二年崔胤已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其二，王重荣死

于光启三年（887年），不可能在乾宁二年辟其为从事。所以，崔胤之及第时间当在光启三年以前。韩偓则是龙纪元年（889年）擢进士第后，佐河中幕府。二人是否有一段时间的同僚关系，已不得而知。前面我们讲到，在韩偓入朝为刑部员外郎后，为时权所挤，值盘石出镇藩屏，朝选宾佐，以其为掌书记。这位朝中盘石为谁，唐末宰辅大员中无有以此为字号者，当为韩偓之隐喻。检大顺、光化年间诸史记，这一历史时期，藩镇跋扈，各据一方，诸镇或父死子继，或军中另推，除崔胤几次以朝臣出为节使外，未有类似事例。据《资治通鉴》，在这期间崔胤之出为节使共有三次。一次是乾宁二年，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后，王重盈之子王珙与重荣之子王珂争为节使，唐廷即任命崔胤为护国（即河中）节度，但河中拒不接受，迁延半年之久，只好收回成命，又以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第二次是乾宁三年七月，崔胤又被任命为武安（湖南）节度使，至九月，被召还。第三次即前述光化三年被派往岭南为节度使。三次出为节使，只有一次成行到任，即乾宁三年之为武安节度使。韩偓应当是此次随其至湖南，为掌书记，这也算得上是患难之交吧。崔胤此人外凝重而内奸诈，一直被史家目为奸臣，韩偓亦在天复六年后与其相左，所以在诗题中未出现崔胤字号，而代之以“盘石”。

到光化三年下半年，崔胤权势炙手可热，而韩偓与他的关系也到了顶点。史称：“偓尝与胤定策诛刘季述，昭宗反正，为功臣。”这种合作，非生死之交不可为。这一事件，对韩偓的政治生涯是一大转折。

光化三年十一月，宦官左军中尉刘季述等人率禁军发动宫

廷政变，将昭宗禁锢于少阳院，诏令太子即位。刘季述本想杀崔胤，但慑于他与朱全忠的关系，只解其度支转运盐铁使之职，估计韩偓、王溥也同时被解除副职。当此危急之时，崔胤外连朱全忠，内与韩偓等朝臣密谋，诛杀刘季述，迎昭宗反正。天复元年正月初一，崔胤利用禁军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杀刘季述等人，昭宗复位。

昭宗复位后更加倚重崔胤，崔胤荐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王溥与韩偓当年都在崔胤幕下为副使。王溥又荐韩偓为翰林学士，崔胤与昭宗当然同意。

唐代后期，翰林学士典掌机要，地位显赫。韩偓身膺此任，一时意气昂扬，每以匡扶天下为己任，而昭宗也想倚重其三二人，收回业已失去的内权外权。史称：“上之反正也，中书舍人令狐涣、给事中韩偓皆预其谋，故擢为翰林学士，数召对，访以机密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二）韩偓此时的心境，从其诗中可以得到最好的体现。

韩偓有诗《六月十七日召对，自辰及申方归本院》，由诗题“自辰及申方归本院”，便可见其受倚重之情况以及其自身对这一情况之自得。诗中所抒更是如此：“清暑帘开散异香，恩深咫尺对龙章。花应洞里寻常发，日向壶中特地长。坐久忽疑槎犯斗，归来兼恐海生桑。如今冷笑东方朔，唯用诙谐侍汉皇。”《雨后月中玉堂闲坐》也写的是同一心态。诗写道：“银台直北金銮外，暑雨初晴皓月中。唯对松篁听刻漏，更无尘土翳虚空。绿香熨齿冰盘果，清冷侵肌水殿风。夜久忽闻铃索动，玉堂西畔响丁东。”这首诗的后面有一段自注：“禁署严密，非本院人，虽有公事，不敢遽入。至于内夫人宣事，亦先引铃。每有文书，

即内臣立于门外，铃声动，本院小判官出受。受讫，授院使，院使授学士。”这段文字从字面看，只是对后二句诗的阐释，但从行文寓意却不难看出作者对身处此中的一种自豪与欣然。

从天复元年初至年底昭宗被劫往凤翔的近一年间，是韩偓政治上最为得意的时期。一方面，他的确得到昭宗的倚重，“自辰及申方归李院”以及“坐久忽疑槎犯斗，归来兼恐海生桑”，“夜久忽闻铃索动，玉堂西畔响丁东”，都不是虚构之辞；但另一方面，韩偓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也的确虚构了一场梦里锦绣，一派盛世太平、明君贤相的景象。如《中秋禁直》写道：“星斗疏明禁漏残，紫泥封后独凭阑。露和玉屑金盘冷，月射珠光贝阙寒。天衬楼台笼苑外，风吹歌管下云端。长卿只为长门赋，未识君臣际会难。”《侍宴》诗写道：“蜂黄蝶粉两依依，狎宴临春日正迟。密旨不教江令醉，丽华微笑笑皇慈。”《苑中》诗写道：“上苑离宫处处迷，相风高与露盘齐。金阶铸出狻猊立，玉树雕成狒狒啼。外使调鹰初得按（自注：五方外按使，以鹰隼初调习，始能擒获，谓之得按），中官过马不教嘶（自注：上每乘马，必阉官驭以进，谓之过马。既乘之，而后蹀躞嘶鸣）。笙歌锦绣云霄里，独许词臣醉似泥。”读读这些诗句，品味一下其自注，我们看到的只是春风得意的侍臣与雍容高贵的君主，而当时晚唐社会的诸镇割据、四方战火、权阉弄权、朋党之争，以及帝王的无奈与臣子的凄楚，好像都烟消云散了。

诗人对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反映。关键是对现实，韩偓在诗作中如何认识与把握。我们可以读一下其《锡宴日作》。该诗自注云：“是岁大稔，内出金币赐百官，充观稼宴。学士院别赐越绫百匹，委京局句当。后宰相一日宴于兴化亭。”诗云：“玉

衔花马踏香街，诏遣追欢绮席开。中使押从天上去（自注：是日，在外四学士，排门齐入，同进状辞赴宴所，奉宣差学士院使二人押去），外人知自日边来。臣心净比漪涟水，圣泽深于潋滟杯。才有异恩颁稷契，已将优礼及邹枚。清商适向梨园降，妙妓新行峡雨回。不敢通宵离禁直，晚乘残醉入银台（自注：当直学士二人，至晚，学士院使二人却押入直，余四人在外，可以卜夜。内臣去外，知熟间丞郎给舍多来突宴。余是日当直，故有是句）。”

如果只看韩偓的这些诗篇，我们似乎可以定论，这是位不谙世事的洞中长乐公，或者是不以国计民生为念，只有个人安乐奢逸的遗老遗少。但真实的韩偓并非如此，他的确是在编织，但他编织的只是一场梦，一派梦里锦绣，暂时求得几十年染濡难解的致君情结的实现，而现实中的他，却又十分的清醒，可以说是一位不负其任的难得朝臣，在唐末政坛的浑浊中，不啻一条清溪。

如前所述，韩偓之在朝中得志，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崔胤，但他对崔胤又不是盲目追随，而是以朝纲为前提，力挽既倾。

天复元年（901年）初，昭宗反正后，崔胤暗召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率兵来朝，求取封赏，以制衡宦官，昭宗为李茂贞加官守尚书令，进爵岐王。辞行之时，崔胤担心宦官仍典禁军，势力过重，讽使李茂贞留兵京师，以相制衡。韩偓反对此举，与崔胤力争。崔胤为自己开脱：“兵自不肯去，非留之也。”韩偓反诘道：“始者何为召之邪？”又劝道：“留此兵则家国两危，不留则家国两安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二）但崔胤一意孤行，不予理睬。崔胤的策略很清楚，外连藩镇，内制宦官，在此基

础上挟制昭宗，控制朝政。

不过，唐廷当时的混乱局面，远非崔胤所可为，尽管其号令不出国门，各地藩镇坐以自大，自行其是，但内廷仍然纷争不已，宦官们握有禁军，虎视眈眈，与崔胤犹如水火。初时，崔胤也确被昭宗倚重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二称：“时上悉以军国事委崔胤，每奏事，上与之从容，或至然烛，宦官畏之侧目，皆咨胤而后行。”崔胤想利用这一时机，将宦官全部清除。韩偓则屡屡劝阻道：“事禁太甚。此辈亦不可全无，恐其党迫切，更生他变。”崔胤不从。六月丁卯，昭宗单独召见韩偓，问道：“敕使中为恶者如林，何以处之？”偓答云：“东内之变，敕使谁非同恶！处之当在正旦，今已失其时矣。”正旦，亦即当年正月初一，诛刘季述等人时。昭宗反问：“当是时，卿何不为崔胤言之？”韩偓就此发了一通治国宏论，他说：“臣见陛下诏书云：‘自刘季述等四家之外，其余一无所问。’夫人主所重，莫大于信，既下此诏，则守之宜坚；若复戮一人，则人人惧死矣。然后来所去者已为不少，此其所以恼恼不安也。陛下不若择其尤无良者数人，明示其罪，置之于法，然后抚谕其余曰：‘吾恐尔曹谓吾心有所贮，自今可无疑矣。’乃择其忠厚者使为之长，其徒有善则奖之，有罪则惩之，咸自安矣。今此曹在公私者以万数，岂可尽诛邪！夫帝王之道，当以重厚镇之，公正御之，至于琐细机巧，此机生则彼机应矣，终不能成大功，所谓理丝而棼之者也。况今朝廷之权，散在四方，苟能先收此权，则事无不可为者矣。”这番话打动了昭宗，昭宗十分信赖地道：“此事终以属卿。”

崔胤谋尽诛宦官，一方面是为身谋，为擅权之需要；另一

方面则是唐后期以来南衙北司争斗的延伸。唐后期以来，宦官迭相干政，左右君主，朝野上下民怨沸腾，诛杀宦官的确也是人心所向。但韩偓并不是要站在宦官一边，他与崔胤的区别仅在于“尽诛之”还是诛其一部。韩偓主张先诛首恶，再收藩镇之权，重振朝纲。在这个问题上他显得很有信心，这是唐后期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。那么，韩偓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呢？胡三省在《通鉴注》中曾感叹道：“呜呼！世固有能知之、言之，而不能究于行者，韩偓其人也。”这话可谓一语中的。

面对崔胤的强硬，权阉韩全海加紧了对禁军的控制，更严重的是，他还与李茂贞留下带兵驻守京师的李继筠来往密切，为其势力扩张提供了空间。韩全海原是凤翔监军，此时为枢密使，典禁军，他与禁军的几位首领密切交结，计划以兵制上。一日，昭宗召韩偓问道：“外间何所闻？”答：“唯闻敕使忧惧，与功臣及继筠交结，将致不安，亦未知其果然不耳。”昭宗对此已深有感触，道：“是不虚矣。比日继海、彦弼辈语渐倔强，令人难耐。令狐涣欲令朕召崔胤及全海等于内殿，置酒和解之，何如？”韩偓不同意此举，认为：“如此则彼凶悖益甚。”昭宗无奈地说：“为之奈何？”韩偓建议道：“独有显罪数人，速加窜逐，余者许其自新，庶几可息。”昭宗当然只好接受这一建议，但此时的宦官，势力已固。他们不仅牢牢掌握着禁军，而且还与李茂贞的留守兵马勾结成了一家，与凤翔李茂贞互相连接，根本不把一个空洞洞的唐皇放在眼中，所以，当昭宗下诏将一些宦官派往外地做监军或是将其贬守诸院时，宦官们根本不予理睬，诏书成了一纸具文。

不仅如此，他们又反过来要昭宗贬逐韩偓等人。据《新唐

书·韩偓传》所记，李彦弼等人秉韩全海之意，诬告韩偓漏泄禁中语，不能参与朝政。昭宗当然不从，十分不高兴地反问道：“卿有官属，日夕议事，奈何不欲我见学士耶？”

到此时为止，所谓的李唐朝廷陷入了一个不可为的境地。一方面，号令不出国门，各地群藩割据，虎视眈眈；而另一方面，即使在朝中宫中，一国之君也无任何威仪，诏令如同具文，朝政由宦官与禁军首领把持，实际上已无朝政可言。那些禁军首领们根本没有上朝恭谨，也没有帝王的概念，每每在殿中目无帝王，饮乐自如。

崔胤本想利用李茂贞遏制宦官，但事与愿违，两者反而沆瀣一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又想利用据有关东广大地区的朱全忠解决宦官问题，便诈称密诏，要朱全忠率军前来迎驾，朱全忠当然也想利用这一时机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迫使唐廷迁往他控制下的洛阳，但宦官集团与李茂贞是不会拱手相让的，一时间，山雨欲来，唐廷上下更加混乱。

九月初，昭宗急召韩偓，云：“闻全忠欲来除君侧之恶，大是尽忠，然须令与茂贞共其功；若两帅交争，则事危矣。卿为我语崔胤，速飞书两镇，使相与合谋，则善矣。”这一想法实在太天真了。他又愤愤地对韩偓说：“继海、彦弼辈骄横益甚，累日前与继筠同入，辄于殿东令小儿歌以侑酒，令人惊骇。”对于势态发展，韩偓看得十分清楚，但又无可奈何。他说道：“臣必知其然，兹事失之于初。当正旦立功之时，但应以官爵、田宅、金帛酬之，不应听其出入禁中。此辈素无知识，数求入对，或僭易荐人，稍有不从，则生怨望；况唯知嗜利，为敕使以厚利雇之，令其如此耳。崔胤本留卫兵，欲以制敕使也。今敕使、

卫兵相与为一，将若之何！汴兵若来，必与岐兵斗于阙下，臣窃寒心。”看到韩偓如此，昭宗更是无奈，“但愀然忧沮而已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二）。

当然，无奈为无奈，韩偓还是尽到了最后一份心力。他劝崔胤督促李茂贞撤回卫兵，并上表彰示宦官之罪，诛杀韩全海等人。若不奉诏，便允许朱全忠率军入朝。这是想利用朱全忠的压力，迫使李茂贞杀韩全海并撤回卫兵。且不论李茂贞是否会如此天真轻信，韩全海之党见形势如此，早已暗中做好了准备，而李茂贞也并不想与崔胤及唐廷合作。十月，韩全海等发禁兵戒严，完全禁止出入，控制了宫中及整个京城。当时，昭宗被困于宫中，而崔胤及百官均避至崔胤所居之开化坊，关东诸藩镇兵在京师者均集中于此。

十一月初，昭宗被韩全海劫持，抵达凤翔，崔胤与百官多留京师。韩偓闻讯后，追至户县，与部分朝官同往凤翔。朱全忠紧接着也挥师西入关，过长安，围逼凤翔。从此，直至天复三年初，战战停停，昭宗所在之凤翔多在围困之中。随着昭宗的西行，韩偓的理想与抱负也化为泡影。

二

昭宗被劫往凤翔，可以说是韩偓政治梦幻的第一次破灭，他一年来为唐昭宗筹划的所有权略，至此都烟消云散。到凤翔后的昭宗，既受制于权阉韩全海，更受制于李茂贞，实际上是被囚废的名义君主，作为侍臣的韩偓，境遇与心境可想而知。

天复二年《冬至夜作》写道：“中宵忽见动葭灰，料得南枝

有早梅。四野便应枯草绿，九重先觉冻云开。阴冰莫向河源塞，阳气今从地底回。不道惨舒无定分，却忧蚊响又成雷。”《秋霖夜忆家》（自注：随驾在凤翔府）写道：“垂老何时见弟兄，背灯愁泣到天明。不知短发能多少，一滴秋霖白一茎。”这种“惨舒无定分”，“蚊响又成雷”与浓浓的乡思相交织，告诉我们的是对朝政的失望与伤感，与前不久在京师的诗作可谓天上地下。我们还可以再读一首他在京师时所作《朝退书怀》：“鹤帔星冠羽客装，寝楼西畔坐书堂。山禽养久知人唤，窗竹芟多漏月光。粉壁不题新拙恶，小屏唯录古篇章。孜孜莫患劳心力，富国安民理道长。”当“孜孜莫患劳心力，富国安民理道长”之际，不会有如此强烈的乡思与忧患。

心境如此，但韩偓又不失辅臣之义。昭宗至凤翔后，“京师无天子，行在无宰相”，境遇之窘迫，难以言喻。而随行之朝臣，仅有韩偓等数人而已，因而韩偓更成为昭宗的心理依托。被擢为兵部侍郎、翰林学士承旨。

天复二年四月，回鹘派使节到凤翔，要发兵赴难，实际是要协助抗御朱全忠，昭宗命韩偓签书准许。韩偓此时头脑十分清醒，他认识到昭宗恐怕只有借助朱全忠的力量才可能重返京城，如果朱全忠被凤翔击败，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因此，上言反对此事。他认为：“所赐可汗书，宣谕以小小寇窃，不须赴难，虚愧其意，实沮其谋。”昭宗遂放弃初衷，一心等待朱全忠的救援。随着朱全忠围困的持续，李茂贞与宦官们也加紧了对昭宗与韩偓等人的监控，不许他们随便接触。到这年年底，凤翔形势更是窘迫。适逢大雪，城中食尽，冻饿死者不可胜计。昭宗“鬻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”；“十六宅诸王以下，冻

餒死者日有数人。在内诸王及公主、妃嫔，一日食粥，一日食汤饼，今亦竭矣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三）一日，昭宗遣赵国夫人至学士院，看到监管的二名宦官不在，亟召韩偓、姚洎，窃见之于土门外，执手相泣。韩偓向昭宗通报道：“崔胤甚健，全忠军必济。”昭宗听后十分高兴。韩偓、姚洎催昭宗速速回宫，“无为入知”（《新唐书·韩偓传》）。君臣至此，也实在可悲。

在这种困境中，韩偓所处的角度十分微妙。就李茂贞与韩全海而言，他们明了韩偓与崔胤的关系以及韩偓的态度，但他们为了安抚人心，对随驾的这位重臣，又不能不有些优容。就韩偓本人而言，他尽管与崔胤在此之前争执颇多，但多非根本之争。而且，在此次围困中，他对于崔胤借朱全忠之力迎救昭宗，又完全认同，因此他在凤翔的表现是，既不同流合污，而又给李茂贞留有一定余地，做得比较圆滑、含蓄。

在朱全忠大军压境、李茂贞拚力抵御之时，韩偓并不表现出什么倾向。而是依然以朝臣身份到城墙巡视，而且也把朱全忠之军呼为贼军。有诗写道：“仗剑夜巡城，衣襟满霜霰。贼火遍郊垌，飞焰侵星汉。积雪似空江，长林如断岸。独凭女墙头，思家起长叹。”（该诗题为《乾宁三年丙辰在奉天重围作》，乾宁三年当为天复三年之误）若不是末句“思家起长叹”，在诗中我们看到的真是一位仗剑巡城、同仇敌忾的韩偓。这首诗恐怕也是写给李茂贞等人看的。不过，在朝政大事上，尽管昭宗与韩偓都已受制于人，但在有限范围内，韩偓还是尽力维持礼数。比如，昭宗至凤翔后，按李茂贞等人的旨意，新任命了二位宰相韦贻范与苏检。韦贻范任相后，多受人赂，许以官，但不久便以母丧罢相丁忧。债主们不停地上下喧闹，韦贻范每天派人

到李茂贞、韩全海处，求复为相，两人胁迫昭宗答应了此事，要次日上朝时颁诏，结果，韩偓坚持不草诏，并言：“吾腕可断，此制不可草！”而且上疏论此事骇物听、伤国体。学士院二位中使怒谓韩偓道：“学士勿以死为戏！”韩偓将上疏交与中使后，解衣而寝。次日上朝，百官排定，昭宗升殿，但无诏书可宣，此时宦官喧闹声言：“韩侍郎不肯草麻。”李茂贞上言道：“陛下命将而学士不肯草麻，与反何异！”这次，昭宗回答得很巧妙：“卿辈荐贻范，朕不之违；学士不草麻，朕亦不之违。况彼所陈，事理明白，若之何不从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三）当然，此诏不久还是由另一位学士姚洎草就，贻范终复相位。对此事韩偓未再发言。《新唐书·韩偓传》称：“既而帝畏茂贞，卒诏贻范还相，洎代草麻。自是宦党怒偓甚。从皓让偓曰：‘南司轻北司甚，君乃崔胤、王溥所荐，今日北司虽杀之可也。两军枢密以君周岁无奉入，吾等议救接，君知之乎？’偓不敢对。”

在凤翔，韩偓把握住了一点，这就是政治上的不合作，坚持不肯为相。苏检为相后，屡荐韩偓为相，多次向李茂贞及权阉们建议，并派亲吏向韩偓通报，韩偓并不领情，怒声责问道：“公与韦公自贬所召归，旬月致位宰相，讫不能有所为，今朝夕不济，乃欲以此相污邪？”苏检未必要以此相污，但他也的确未看明白“朝夕不济”的形势。

大约在此事月余之后，凤翔在朱全忠围困下，储备耗尽，内部又相互怨尤，人心不稳。李茂贞见大势已去，遂杀韩全海、李继筠、李继海、李彦弼等二十余人，将昭宗一行送至全忠军营。天复三年（903年）一月己巳，昭宗一行终于回到长安。

在凤翔重围中，昭宗与韩偓对朱全忠还抱有一线希望，当